

编者按：2015年10月24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开幕前夕，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22日在北京发布。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自2005年首次实施以来，已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参数和讨论话题。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对“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解读

金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5年，中日关系在经历了数年的严峻局面后开始逐步回稳改善。在2014年11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两国领导人先后实现两次会晤，双方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有序恢复。作为中日两国间持续时间最长、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公共交流平台，北京-东京论坛在进入“新十年”之际，深入分析、准确把握2015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所传达的民意信息，将有助于双方理顺相互认知和定位，把中日之间的政治共识转化为社会共识，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民众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在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和平友好、合作共赢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民众对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抱有相当的关切和期望。

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可度出现了五年来的首次上升。自2010年达到92.5%的峰值后，至2014年这一数字连年下跌，五年间下降了近三成。2015年的数据是，70.1%的普通公众及80.8%的精英群体认为“中日关系对于中国重要”，较去年同比分别上升了五个和九个百分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尽管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双方都坚持和平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道路。正是基于这一重要历史经验，中日在第四个政治文件（即2008年中日两国发表的《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正式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这一政治共识既是战后70周年总结历史得出的一条重要启示，也合乎民意，顺乎民心。调查显示，在对两国关系未来的预判

上，确信以及希望“中日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比率，普通公众为66.1%，精英群体为81.5%，远远超出“可能持续对立”的比率。与此呼应，在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认识上，“和平”与“合作发展”也被中国公众视为最为重要的价值观，普通公众选择“和平”的比率为59.6%，选择“合作发展”的比率为39.6%，精英群体选择“和平”的比率为66.3%，选择“合作发展”的比率为59.3%。

对于中日两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持积极态度，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选择“支持”与“比较支持”的比率分别为54.3%和71.8%，较2014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精英群体变化明显，增加了16.2个百分点。

二、在对中日关系未来总体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中国民众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评价依然以负面意见为主，领土争端、历史等敏感问题持续突出。此外，近一时期日本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等举措引发中国民众担忧。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管控、化解上述消极因素是今后中日关系能否保持回稳向好势头的关键。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虽然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的评价总体上比较接近，仍以负面意见为主，但与2014年相比也并未出现继续恶化的情况。此外，两个群体的变化趋势呈现差异。在普通公众群体中，各项比率与2014年基本持平，其中认为“差”或“比较差”的比率为67.2%（2014年为67.2%）。认为“好”或“比较好”的比率为12%（2014年为14.9%），表示“说不清”的比率为20.6%（2014年为17.1%）。精英群体的评价较去年有较大变化。表现为：第一，持消极看法的比例出现明显的下降，认为“差”或“比较差”的比率为64.8%，较2014年减少了17个百分点。第

二,表示“说不清”的比率出现明显的增加,为28.5%,较2014年增加了17.5个百分点。认为“好”或“比较好”的比率没有变化,为6.8%(2014年为7%)。

关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民众的认知结构自2005年以来基本不变,集中于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两项。与2014年相比,普通公众选择领土争端的比率基本未变,为66.4%(2014年为64.8%),精英群体的比率变化较大,下降了29个百分点,为48.8%。有关历史问题,与2014年相比,普通公众的选择比率基本未变,为31.5%(2014年为31.9%),精英群体的比率变化较大,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为49%。

在对领土争端的解决办法上,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认同度最高的为“为守卫领土,应该加强中方的实际控制”,比率分别为58.2%和48.5%;认同度最低的为“长期搁置,实现共同开发”,比率分别为14.5%和17.5%。但是,在主张加强中方实际控制的比率上,两个群体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普通公众的比率减少了5.5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减少了22.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主张“两国应尽早通过协商争取和平解决”的比率均较2014年有所上升,普通公众增加了11个百分点,为43.6%。精英群体增加了7个百分点,为40.3%。

围绕领土争端,中国民众对未来因此发生军事冲突的预期较2014年更加平和。普通公众选择“不会发生”的比率为39.2%,居于首位,较2014年上升了11.8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为30.8%,较2014年上升了1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选择“未来会发生”的比率虽有所下降,但依然较高,两个群体的比率均超过三成。此外,还有两成的中国民众选择“说不清”,普通公众为19.2%,精英群体为22.8%。

在历史问题上,由于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的特殊年份,中日两国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所以中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对于解决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的相关性,两个群体均首选“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无法发展”,普通公众的比率为47%,较2014年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为39%,与2014年基本持平。

有关解决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的必要选项,尽管普通公众与精英群体在具体选项的入选率和排名上有差异,但列在前三位的选项大致相同,分别为“日本尊重有关侵

略战争的历史定论”、“日本真诚地对侵略历史反省和道歉”及“日本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历史教育”。较2014年,两个群体对“日本尊重有关侵略战争的历史定论”的选择比率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表现出中国民众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警惕。

2015年8月14日,安倍发表“战后70年首相谈话”。对于此谈话,中国民众的不满意度高达七八成,其中普通公众的不满意度为74.1%,精英群体的不满意度为85.3%。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两个群体的首选项均为“不论以何立场,都不应该参拜”,普通公众为60.2%,精英群体为53.5%。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民意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今后日本能否就此发出积极信息值得持续关注。

在历史、领土问题之外,2014年以来日本对外与美国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对内强推安保法案,引发中国舆论的高度关注,60.3%的普通公众以及71%的精英群体认为“存在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或地区”。在被问及具体国家或地区时,均首选日本,普通公众的比率为81.8%,较2014年增加了26.6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比率为79.6%,与2014年持平。

三、近年来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呈现减少迹象,调查反映出中国舆论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对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举措,多数意见认为首先需要改善两国政府关系。

在中日关系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上,中国民众高度认可两国经济关系的作用和意义。在“互为邻国”的首选项之后,“中日是全球第二、三大经济体”(普通公众为36%,精英群体为56%)以及“中日经济和产业依存度高,具有众多共同利益”(普通公众为35.5%,精英群体为57%)等与经济相关的选项紧随其后。在对改善中日关系最有效途径的判断上,普通公众对强化两国经济关系抱有较高的期待,以31.8%的比率位居首位。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两倍,但两国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并未因此降低,对此中国民众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对中日经济“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看法上,51.1%的普通公众与77.3%的精英群体认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自2012年起,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日贸易额连年下滑。中国民

众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前景不感乐观,约有五成的中国民众认为未来几年两国经贸额将继续减少,普通公众的比率为43.5%,精英群体的比率为51.8%。关于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民众的首选是“改善两国政府关系”,普通公众的比率为50.3%,精英群体的比率为61.5%。

四、当前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依然不高,且负面结构性因素保持多年未变,但对日持正面印象的民众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近八成的中国民众重视民间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民众去日本的意愿时隔三年出现止跌回升迹象。

2015年中国民众对日负面印象比率虽仍然保持高位,但较2014年有所下降,普通公众对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对不好”的比率为78.3%,较2014年下降了8.5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同一比率为42.3%,较2014年下降了16.6个百分点。在负面印象形成的具体因素上,中国民众的选项持续集中于三项:历史问题(普通公众为70.5%,精英群体为86.4%)、领土争端(普通公众为68.1%,精英群体为62.1%)以及日本联合美国包围中国(普通公众为41.1%,精英群体为50.9%)。

另一方面,2015年中国民众对日正面印象的比率也在悄然上升,普通公众对日本“印象很好”和“印象相对较好”的比率为21.4%,较2014年上升了10.1个百分点,精英群体的同一比率为55.1%,较2014年上升了16个百分点。

在“有机会去日本”的意愿上,2015年中国民众一反此前几年持续的消极态度,普通公众表示“想去”的比率较2014年增加了13.2个百分点,比率为35.7%,精英群体同比增加了27.8个百分点,比率为79%。在选择“想去日本”的中国民众中,旅游观光最具吸引力,普通公众及精英群体的比率分别为88%和78.2%。此外,访问历史文化遗产(普通公众为35.4%,精英群体为51.3%)和购物(普通公众为36.3%,精英群体为33.9%)也受到欢迎。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重视民间对话和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76.9%普通公众和79.1%的精英群体认为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在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上,普通公众及精英群体的意见相对一致,集中于三点:一是“有助于加深对对方国家的了解”(普通公众为32.3%,精英群体为64.2%);二是“有助于扩大

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普通公众为43.3%,精英群体为23.4%);三是“通过交流加深双方国民的理解和互信”(普通公众为36.1%,精英群体为72.8%)。

2015年5月“日本3000人代表团访华并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等民间交流活动,在改善两国关系的有效性方面受到中国民众较高评价。但总体来看,中国民众对目前两国民间交流现状的评价并不太高,认为不太活跃的比率,普通公众为40.8%,精英群体为52.3%。

五、近些年来,中日媒体有关对方国家的报道越来越多。作为民众获取对方国家及两国关系信息的首要渠道,新闻媒体需要继续努力,化解两国在彼此认知和定位上的误区,拉近两国国民感情距离。

中国民众获取日本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是本国新闻媒体。89.6%的普通公众以及76.5%的精英群体通过接触中国媒体(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了解日本,这一比率较前两年有所增加。在各类新闻媒体中,普通公众将电视媒体(82.4%)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网络媒体的这一比例为13.2%(PC端,8.5%;移动端,4.8%),报纸入选率为3.6%,杂志和广播入选率则仅均为0.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精英群体将网络媒体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比例接近六成(59.5%)。其中,移动端网络媒体(31.4%)的入选比例高于PC端网络媒体(28.1%)。电视媒体的这一比例为32.4%。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获取日本信息的渠道继续向多样化发展,直接通过日本媒体了解日本信息的比率,普通公众为19.8%,精英群体为21.9%。直接通过日本文化了解日本信息的比率,普通公众为21.9%,精英群体为41.8%。

对于中国新闻媒体报道日本和中日关系的客观公平程度,75.9%的普通公众予以认可,而精英群体的这一比例仅为30%。相对地,不认为中国媒体客观公正的普通公众和精英人士分别占14.8%和42.5%。

整体而言,普通公众和有识之士群体认可网民言论对广泛民意的代表性。在公众受访者中,84.4%认为网络上的言论反映民意;在精英群体中,持相同观点的受访者比例相对较低,但也接近七成(66.8%)。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已有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双方高度珍视,精心维护。未来两国谋求共同发展,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责编:吴奇志

1 立足国家“战略” 探索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

迈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面对国家层面在国际传播上的阶段性转变,面对“融合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使其顺应当前国家的发展;正确处理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使其找准在纵横坐标中的定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我们关注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的规律性和前瞻性问题,探索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

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顶层设计”应当配合着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与中国国家层面的几大战略相呼应,呈现“信息型”“外交型”“创新型”“学习型”四大培养方向。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顶层设计”体系,鼓励和扶持培养院校开展特色鲜明、颇有章程的培养实践,规划和建设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的新闻传播教学培养队伍,探索“融合国际新闻教育模式”和“融合国际新闻学”的发展道路。从国家意识、国际视野、语言能力、传播能力、数据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培养我国国际传播从业者的“高端对话能力”。

2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2015年10月24日,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开幕前夕,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22日在北京发布。作为“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同步舆论调查自2005年首次实施以来,已成为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也为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参数和讨论话题。

当前中日关系虽然开始逐步走出前几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但由于两国之间既有历史感情纠葛,也有现实利害冲突,形势依然敏感复杂。对于双方政府和国民来说,两国在地理上互为邻国的物理属性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在影响力上共为亚洲大国的结构格局也将持续。中日关系已有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双方高度珍视,精心维护。未来两国谋求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发展,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3 习近平外宣思想初探

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举措获得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西方主流媒体把习近平称为中共首个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人。正是从全球视野的宏观层面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对外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习近平的对外宣传思想从宏观上把握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国际影响力;从操作层面上强调把握传播规律,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目标;夯实国内文化根基,培养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自信,主动引导国际舆论,积极把握国际话语权。习近平外宣思想结合当前国内外具体形势,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共历届领导人的外宣思想,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